

范文教材印本化与晚唐体在宋初的传承

——简论抄印转化与唐末五代诗风之关系

查屏球

内容提要 《京兆府小学规》表明唐律绝选本是宋初各类学校的基础教材。这些选本多由唐末传承下来，唐末五代至宋初是抄印转换的初期，也是白体、晚唐体的风行时期，两事密切相关。元、白之后诗人对传播效应有了自觉意识，主动利用刻石、题壁、拓印、雕印等技术出版各类诗集，提升了这类作品的影响。以科场名家为范本的传统与现实的市场效应，使唐末诗家小集与选本多成为各种层次的诗学教材，在商品化的作用下，这类教材类抄本最早转化成印本，加速了晚唐体审美范式的传播，固化了其诗学理念。因此，教材的印本化与商品化客观上传承了晚唐以来形成的诗学传统，建构起以晚唐名家名作为中心的唐诗名篇序列。这是宋人接受唐代文学的起点，也是其诗学知识的基础构成，白体、晚唐体在唐末宋初的流行是传媒技术进化的结果。

关键词 唐诗选本；印刷业；蒙学教材；晚唐体

方回《送罗寿可诗序》言：“诗学晚唐不自四灵始，宋划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1]其《瀛奎律髓》卷二十三评曰：“宋初诸人诗皆有晚唐风味。”^[2]此论屡为文学史家征引，勾稽相关文献，还可从阅读史角度见出这一文学现象的产生背景。如欧阳修《六一诗话》所记儿时学诗事言：

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号《云台编》，而世俗但称其官，为《郑都官诗》。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今其集不行于世矣。

……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其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当时如此，而今不复传矣。余少时犹见其集，其句有云“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诚佳句也。^[3]

这里涉及两种晚唐人小集，一是郑谷的《云台编》，一是杜荀鹤的《唐风集》（又或是周朴的别集），这表明在欧阳修少年时晚唐体诗风仍在流行，各类学校即以晚唐诗为教材教授诗法。现存于西安碑林的《京兆府小学规》形成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列述了不同层次的诗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前两个等级要求“吟五、七言古律诗一首”“吟诗一绝”，应是指依声律要求吟诵，末一等级“念诗一首”^[4]，仅指朗读。使用教材“古律诗”，应是指唐人律绝类选本。由欧阳修所记看，当时各类学校中的诗学教材多是晚唐诗人小集与以此为主体的唐诗选本。这些书在宋代有很长的流传史，如《崇文总目》中就录有《名贤绝句诗》一卷。这是宋人对唐诗最直接的传承方式。宋初士人求仕热情日增，却多以官小位卑的贾岛、郑谷、杜荀鹤等晚唐体诗人之作为法，以至这类苦涩孤寂之音，竟成新兴王朝流行之调，其中原委，应有深解。从书籍史角度看，从唐末到五代、宋初，正是抄印转换时期，这是晚唐诗风流行的一个重要背景。

一 唐末“时文”教材的流行与抄印转换走势的遇合

唐时,随着应试教育日渐流行,及第名人小集已成为了诗学教材的主体,杨綰在大历时即感叹学人:“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5]如李峤进士甲等及第,其《咏物百廿篇》就作为律诗教材风行一时。中唐之后,学人生活多趋于城市化,文化传播效应越发明显,主流审美思潮多受到传播活动的作用。当代文人对传播的自觉意识也有明显上升,如白居易要求新乐府“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体顺而肆”(《新乐府序》),“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寄唐生》),都含有增强传播效应的用心。他们还将这一文学理念扩展到整个文学创作,形成了以追求传播效应最大化的平易朴质的艺术风格,并凭着《长恨歌》与《元白酬唱集》这类极具传播效应的作品,创造了一种流行文化,张扬了歌辞化的诗学理念。姚合、贾岛以及其后追随者组成的晚唐诗派,脱略赋体语的滞重,讲究语言的省净巧妙,也有降低接受障碍增强接受效应的用意。在唐末张为《诗人主客图》中,白居易的广大教化派与李益的清奇雅正派,分置两类,姚合、贾岛之作归为后者,而这一派中张籍、杨巨源、姚合、方干、马戴、贾岛、项斯等人作品又与元白诗风类似,因此,白体与以姚贾为代表的晚唐体在内在艺术精神上是相通的,都以增强接受效应为努力方向。精工细巧的晚唐体,就是将白体风格精致化了,以锻句炼字之功创作出一种晓畅之美,费尽心力打造平淡,也是为了保证接受效应的最大化。正是在这一艺术导向作用下,长期居正宗地位的典丽化的“文选体”让位于简淡素雅的白体、姚贾体,流行的诗学教材也是《元白酬唱集》等当代诗人之作。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记:“唐杜荀鹤尝游梁,献太祖诗三十章,皆易晓也,因厚遇之。”^[6]“易晓”是杜荀鹤献诗成功的主要因素,这不仅是杜氏的权宜之计,而是一时风气使然。

其时最有影响的诗人作品多能流行于校舍之中。如白居易《与元九书》云:“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

有题仆诗者。”^[7]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予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8]又如,皮日休《伤进士严子重诗》序言:“余为童在乡校时,简上抄杜舍人牧之集,见有《与进士严恽诗》。”^[9]此处即说到乡校学生以杜牧诗为教材的事。又,至唐末贾岛影响越来越大,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六记:“唐李洞字子江,苦吟有声。慕贾浪仙之诗,遂铸其像事之,诵贾岛佛不绝口,时以为异。五代孙晟……为道士,居庐山简寂宫。尝画贾岛像置屋壁,晨夕事之,人以为妖。”^[10]其诗也为学人奉为教材,五代宋初流传的《贾岛诗格密旨》《李洞贾岛诗句图》等诗格诗法,多是与贾岛诗集配套的导读教材。晚唐这类诗学读本以绝句集为多。如王建《宫词》、钱珣《江行无题》都是百首绝句小集。这类绝句小集语言多具歌辞特色,晓白明畅,易成畅销读物。现知咏史绝句集就有胡曾《咏史绝句》一卷、汪遵《咏史诗》一卷、周昙《咏史诗》八卷,以及孙玄晏《咏史组诗》等,都具有教材功能,这种书的增多表明当时书籍市场一直存在着这一需求。《崇文总目》中也列有《赵氏编年诗》2卷,李雄《鼎国诗》等七律组诗^[11],应属层次更高的诗学教材,敦煌文献中也存有赵嘏《读史编年诗》^[12],足见这类教材流传至广。

唐末形成的诗家小集与各种教材类选本,在宋初仍在流传与使用,这些书多属蒙学读物,官方史志较少关注。细加梳理,还是可以寻得一些材料作参考。如郑樵《通志·艺文略》等著录的就有:《垂风集》十卷(采张籍等十人诗)、《名贤绝句诗》一卷、《前辈咏题诗集》二卷(集唐中元以来中书所试诗笔)、《中书省试咏题诗》一卷(采唐开元至大中以来咏题之诗三百五十篇)、《唐五僧诗》一卷(鸿渐等)、《唐十哲僧诗》一卷(清江等)、《才调集》十卷(唐韦谷集)、《诗纂》三卷(梁陈康图集)、《资吟集》五卷(梁钟安礼集)、《临沂子观光集》三卷(梁王穀集)、《极玄律诗例》一卷、《又玄集》一卷(伪蜀韦庄集)、《江南续又玄集》十卷(伪唐刘吉集)、《拟玄集》十卷(梁陈康图集)、《连璧诗集》三十二卷(檀溪子道民集)、《礼部所投诗卷》、《国风总类》五十卷(王仁裕集)、《备遗缀英》

二十卷（伪蜀王承范集）等^[13]。这类流行性选本在内容上多有兼容性，后出者多是在继承前出选本篇目的基础上再加以延展补充。如姚合《极玄集》主要选大历诗人作品，对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篇目有明显的继承。之后，韦庄《又玄集》收150人近三百首诗，晚唐诗近一半，本书成于光化三年（900），但书名与篇目对姚合之作多有汲取。仅从书名看，南唐的《江南续又玄集》、后梁的《拟玄集》，都模仿了这一书名，内容上也当有相承性。与“不录存者”的传统不同，这些教材性的选本多以当代诗人作品为主，其中以“白体”“姚贾体”居多，在童蒙教育中又以《名贤绝句》类与诗家小集最为流行。

这类书公元10世纪末还曾传布到新罗、高丽、日本，如流传于新罗高丽的唐人七律选本《十抄诗》，虽是由新罗留学生自编的，但很可能是以一种唐末流行选本为底本，所选除少数中唐诗之外，绝大部分都是晚唐诗作，体现了以当代人作品为教材范本的风气。又如，今存韩国的唐人五绝选本《唐贤诗范》，成书于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也是沿续着唐末以来的诗教风气。又如，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载有《刘白唱和集》2卷、《杭越寄诗》23卷。《通宪入道（1106—1159）藏书目录》也载《杜荀鹤集》一卷、《章孝标集》卷上。这都表明这类教材已成为东亚汉文世界的流行读物。

这类教材型诗选流传如此之广，又与抄印转换的历史进程相关，就技术而言，早在武后时期就有雕版印刷佛经之事^[14]，但民间大规模印书多在唐文宗朝尤其是唐懿宗朝之后。如《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记：“（大和）九年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15]这表明至9世纪前半叶，剑南、淮南道两处印制历书已广为流传，40年后，这类印本已成通行之物，王谔《唐语林》卷七记：“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货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徵节候，因争执，里人拘而送公。”^[16]这应是中和元年（880）僖宗入蜀到光启元年（885）返回长安之

间的事。又，佛道二教都积极利用这一新技术。范摅《云溪友议》卷下记：大中元年至三年（847—849），“乾干尚书泉苦求龙虎之丹十余稔，及镇江右乃大延方术之士，乃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17]敦煌藏经《金刚经》印卷（Ch.ciii.014）卷末印有题字：“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司空图《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言：

自洛城罔遇时交，乃楚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镂……再定不刊之典，永资善诱之方。必期字字镌铭，种慧良而不竭。^[18]

此文写在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左右，文中言“重雕”，之前已有“楚印本”。又，宋人《爱日斋丛抄》卷一引柳玘《柳氏家训序》称：“中和三年癸卯夏，銓與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19]日本僧人宗睿《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中录有“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并说是在咸通六年（873）于长安购得。可见，早在9世纪70年代初，成都这类教材读物已传到长安了；至五代时，即10世纪前期，印书业开始了加速度发展，西蜀、后唐都有了官办印书之事，在唐亡次年，地方官任知玄就印杜光庭《道德经广圣义》30卷^[20]。

大规模刊书是从刊印教材开始的，《资治通鉴》等史书都有记，宋人《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九所记尤详：

先是公（毋昭裔）在布衣日，常从人借《文选》及《初学记》，人多难色，公浩叹曰：“余恨家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板印之，庶及天下习学之者。”后公果于蜀显达……因命工匠日夜雕板，印成二部之书，公览之欣然曰：“适我愿矣。”复雕九经诸书。两蜀文字由是大兴……初其在蜀雕印之日，多为众所鄙笑，及其后乃往假贷，虽樊侯种杞梓未可同年而语。^[21]

此处记录了《文选》类文学教材被印本化的初始过程，时间在公元940年左右，蜀中印刷业至此已发展一百多年了。印书之事曾为人“鄙笑”，是因为

印本在初期作为一个新生之物，只是民间“俗物”。又，后唐刊九经是抄印转换的历史性标志，宋王溥《五代会要》卷八《经籍》记：

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秩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22]

这是中央教育机构首次以雕版印刷的方式发行统一教材，是官方最高学术机构对这种新型文本形态的肯定，提升了印刷文本的地位。如宋汪应辰《文定集》卷十《跋贞观政要》言：“绍兴三十二年八月偶访刘子驹于西湖僧舍，出其五世所藏之本，乃后唐天成二年国子监板本也。”^[23]南唐、吴越也有了类似的事情。仅《宝篋陀罗尼记》一书，钱氏吴越国就刊印了84000卷，刊印活动延续了20年，印卷传遍江南^[24]。宋统一南唐、吴越后，收集到数万卷图书北上，其中多数应为二地制作的印本。《旧五代史·晋太祖纪》：“寻令荐明以《道》《德》二经雕上印板，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25]《宋史·聂崇义传》：“汉乾祐中，累官至国子《礼记》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刊板于国学。”^[26]可见，后唐以后朝廷已设有刊印机构了。

经过半个世纪的普及，到11世纪初，印刷书籍已居主流了。《宋史》卷四百三十一《邢昺传》记：“是夏（景德二年），上幸国子监阅库书，问昺经版几何，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27]不到50年，皇家藏书仅经部就增长了20多倍，其他类书籍的增长也应如此。抄印转换极大地提高了书籍生产的效率，使得宋初成为书籍增量的爆发期，流行于乡校私塾的各类诗学教材也应相应地印本化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记太平兴国二年（978），江州庐山白鹿洞学徒数千百人，乞赐九经，太宗诏国子监传送。国子监能供给地方上千人学校教材，亦当是印本充足。

以上就是公元9世纪中叶到11世纪150年间书籍史背景，由此看来，晚唐体的流行及被宋人的接受，既是进士科文化下移的结果，又与当时文本形态从抄写到印刷的转变有关，它是书籍印本化对学人知识结构影响的结果。两者的关涉点主要在以下几点：首先，抄印转换推进书籍生产的民间化、商业化、私人化，带来了书籍爆增，其中尤以晚唐诗家小集与选本为多，构成了宋初学人天然的阅读土壤。其次，这一时期的各类印本第一次将学人教材固化了，改变了以往不稳定、不统一、随意性状况。如欧阳修所叙一些地位不高，声名不显的晚唐诗人诗句也能为宋人熟知，就是因为他们作品已进入印本教材中。再次，相沿相承的印本教材构建了宋人接续唐人的直接桥梁，对宋人唐诗观产生了初始化作用。他们的偏于白体、姚贾体的晚唐诗观多是建立在对唐末诗家的认识上的，这是他们接触最多的诗学教材。但是，抄印转换发生在动荡年代，早期贝叶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印本，在印本线装化之后，多已不存。留存下来的文献记录甚少，考古实物无多，对其中一些具体的环节只能作初步的推断，尤其是民间的私人性的非中心区域对时文小集的刊印多被刊印九经这类重大事件遮蔽了，我们只能在残存线索中寻得一鳞半爪。

二 唐末五代诗家对印本の利用与晚唐体流行

在武后时代已出现的雕版印刷要等到二百年后才广泛运用，是因为在稳定的贵族化文化机制里，有一个庞大而成熟的抄书机制，如《旧唐书·职官志》记仅中书、门下抄写、制书人员总数有250多。据此推想，其他官府及民间寺院等处抄手更是不计其数。以铺张人力来繁复程序形式，是贵族文化区别于平民文化的一种表现，在商品化作用下，技术的进步，使得贵族化精神产品不断趋于平民化、普及化，这是社会进化的趋势。在抄印并行的时代，抄写体系代表了正宗，印本则是作为边缘之物被鄙视与排斥。但是，唐僖宗之后，社会动荡，原有的文本生产体系已遭到破坏，印刷作为复制文

本最简便的方式日渐流行起来,这一改变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也是书籍观念的一次变更。

首先,更新了正统化的书籍观念,扭转了抄重印贱的意识,推升了印本化的晚唐小集的地位。在抄印并行时期,抄写体系生产的书籍多为体现朝廷意识形态的儒家经典之类,且须经过名家推荐、朝廷认可的程序。印本则作为商业化的俗物,多有随意性、私人化特点,故不为人所重。五代时,这一观念在政治中心区之外先发生变化,南唐、吴越、蜀中相对稳定,印刷业发展更盛,印本书籍累积量很大。如,江少虞《事实类苑》卷三十一载:“乾德元年,平荆南,诏有司尽收高氏图籍,以实三馆。三年九月,命右拾遗孙逢吉往西川取伪蜀法物图籍印篆赴阙,得书万三千卷送三馆。开宝九年,平江南,命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余卷,悉送史馆。”^[28]《宋史·张洎传》记南唐皇帝李煜宠信张洎,曾赐书万卷给他。荆南高氏,仅辖二州,其藏书竟引得宋廷关注,南唐不足40年历史,藏书数万卷,并能赐书万卷,当缘于刊书发达之故。又,《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九载:“(后唐同光三年)十月,两淮钱鏐留后钱元瓘、苏州节度使钱元璠,各贡进……九经书、史汉唐书共四百二十三卷。”^[29]其为中原朝廷所重者则是新出之印本。《宋高僧传》卷二十八载:“释永安……乃以《华严》李《论》为会要,因将合经,募人雕板,印而施行。”^[30]联系到上述大规模印刷《陀罗尼经》一事看,刊书之事在吴越国应已普及。这些地区原来的抄书机制就没有京洛地区发达,对于书籍取舍与认定与正宗体系也不同,所以,印行的书多不是儒家经典,而是文学类书籍,《册府元龟》卷六百八载:

周田敏为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广顺三年六月,敏献印板书五经文字、五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策……唐朝亦于国学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给,无能别刊立。常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乃奏闻。^[31]

此处叙及了从后唐到后周官方刊经的原委,并指出之前吴蜀刊书虽多,却无经典。蜀吴作为边缘化地区,其刊书多为民间私人活动,或依其趣,或取

其利,并无定规,如西蜀印贯休集、吴越印方干集,都是非官方化的自发活动。教材化的时文小集多成为了流行读物,受众较广,故能较早进入印本之列。随着印本地位的提升,一批寒士小集印本也作为教材堂而皇之进入各类学校,如下文所说的徐夤、陈咏等人诗集就是如此。虽然,他们地位不高、家世不显,但借助印本这一种新型传媒技术,竟也成为一时期流行文化中的偶像。这也推升了寒士、隐家形象的文化地位,确立了苦吟诗派追求的清奇淡雅诗风的经典性。宋初九僧、魏野、林逋等醉心于此,就是这一文化环境熏陶的结果。

其次,印本的增多也改善了原有的书籍流通方式。纸抄时代的书籍,流传不易,不得朝廷秘阁收藏,能传世者甚少。因此,取定名家,请给纸笔,献书朝廷,再由官方抄写机构抄写收藏,是印前时代文人传播作品的主要方式。印本一开始作为非主流文本,仅流行于民间。如元稹《白氏长庆集》言:“二年间,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书肆之中也)。”^[32]此处“模勒”,是否指雕版印刷,学界尚有争议,但以其为一种文本复制方式则无疑议,所叙应是长庆四年(826)前的事。在唐代文人中,白居易是最重保存文集的人,他不以进献秘阁为目的,更重民间流传,但也有重抄贱印的旧观念,只将自己文集抄写五份,分藏于五处。但抄本流传不易,一是传播范围有限,白居易在洛阳圣善寺专门立碑写下阅读规定,只能在寺内阅读,不可携出;二是书价昂贵,传本无多。其时抄卷一般是一卷千钱,白集有70卷,相当于一个五品官的月俸^[33],远超普通文人的认购能力。不足百年,白集原本多散佚。印本数量大、费用相对低廉,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出版的繁荣,不仅是因生产书籍的成本降低,更主要的是使作者获得了更大的出版自由。由《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看,这一时期诗人小集尤多,与此出版环境当有关系。

至懿宗朝后文人参与印刷出版之事渐多,如方干集、贯休集都是弟子主持刊印的。今传明嘉靖本方干《玄英先生集》附孙郃《玄英先生传》中有

言：“序成将以付梓云。”^[34]方干诗集在当时已作为习诗者的教材。孙郃《哭玄英方先生》言：“官无一寸禄，名传千万里。”吴融《赠方干诗》：“句满天下口，名聒天下耳。”其诗散布如此之广，当缘已有印本。考虑到钱越已能刊印八万多卷《陀罗尼经》这一背景，其诗集完全有可能在吴越被印制。又如，昙域撰贯休《禅月集后序》记：“众请昙域編集前后所制歌诗文赞，日有见问，不暇枝梧。遂寻检稿草及暗记忆者约一千首，乃雕刻版部，题号《禅月集》……时大蜀乾德五年癸未岁十二月十五日序。”^[35]这些印刷活动都是弟子自发之事，纯属民间自主行为。

社会失序后，文人献书阙下的渠道受阻，印刷以更便捷的传播方式推进了私人作品取得前所未有的传播效应，也进一步提升了文人传布作品的愿望。因此，就有了文人自行刊印本集之事，如《新五代史·和凝传》记：“为文章以多为富，有集百余卷，尝自镂板以行于世，识者多非之。”^[36]和凝之所以引起非议，是因为他跳过了“他人编定，权威认可”的常规程序，自产自售，自我肯定。同时，印书在当时多是商贾的营利行为，和凝以宰相身份营此，也易为人耻笑。“识者”的反应体现了正统观念对新型传媒的排斥，但是，和凝这一行为也表明：一些文人已经感受到印本便捷的传播效应，改变了以印本为俗的观念，主动利用新技术自发传布作品。出版条件的自由化带来了个人诗集出版的繁荣，为宋初学人直接提供了诗学资源。

最后，在抄印并行时代，印本费用是抄本的十分之一，技术的进步推动了书籍商业化的进程，市场化的传播效应提升了中下层诗人出版诗集的积极性，推进了晚唐体小集的增量与流传；同时，也使得这一时期诗集撰作更具商业色彩，文人多能从市场角度考虑读者的接受问题。

例如，敦煌抄卷《崔氏夫人训女文一本（p. 2633, s. 129, s. 5643）》，是据印本抄录的卷子，其文末曰：“上都李家印崔氏夫人一本。”“崔氏夫人劝女诗”是以绝句体写成的劝诫言，是书仪，也是家教类教材，文学性与实用性兼具，流行量较大。“上都李家印”表明这是据印本抄写的，在写本之前印本已有流行。“上都”应是在唐昭宗迁洛前的

说法，即天佑元年（904）之前在长安一李姓书商印制了此书。诗以俗白体写成，且有以“白侍郎”（白居易）署名的赞语，并附有二首诗，虽然是托名之作，但风格近似，据此可见白体在当时图书市场之影响。这件印刷品内容单一，可能就是如元稹所言的单幅“模勒”之物，是一种完全商品化了的书籍。

又如，徐夤《徐公鉤砚文集》卷六《自味十韵》言：“只合沧洲钓与耕，忽依萤烛愧功成。未游宦路叨卑宦，才到名场得大名。梁苑二年陪众客，温陵十载佐双旌。钱财尽是侯王惠，骨肉偕承里巷荣。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37]徐夤于梁开平元年（907年）再试进士，诗作于及第12年后，约在后梁贞明五年（919）。诗人以一种自豪且得意的口吻说其赋在及第前即被人“镌印卖”了，这说明文人已将市场反应与传播效应作为文学评价的一项重要指标。

再如，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郑准讥陈咏》记：“（陈咏）其诗卷首有一对语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鸟点头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谓曰：‘先辈佳句甚多，何必以此为卷首？’颖川（陈咏）曰：‘曾为朝贵见赏，所以刻于首章。’都是假誉求售使然也。”^[38]陈咏是眉州青神县人，于天复四年（904）进士及第归蜀。杜光庭称其为前辈，是因杜在咸通年间也曾蹭蹬科场多年，其见陈咏诗集可能就在此时。陈咏以名作印于首页，类似于为书做广告，明显有促销之意。取定名家已不是他唯一目的了，市场求利也是一个动机。杜荀鹤与陈咏差不多同时，其诗集《唐风集》也有类似的编排方式，以代表作《宫怨诗》为首篇，依此推论，杜集或许也有印本。印本的商业化本性，将诗人与市场联系起来，诗人首先考虑的不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而是如何吸引读者以求畅销。其时最大的读者群就是以科举之士为主体的中下层士人，其诗也当以表现这一群体情感为主。以贾岛为代表的“晚唐体”受到五代、宋初人士人的追捧，就在于这些诗多表现了中下层士人当下的生活、思想与情感：以无为的人生理念显示了内在的自信，以无奈的情景表示对社会不公的失望，以孤芳自赏的态度表达超越凡俗的精神理想，不以轰轰烈烈的功名，不以大

悲大喜的情感,而以淡雅情趣塑造了一代风骨,为失意者提供了精神依托。这些与宋初士人张扬个性的精神需求是契合的,故也能成为宋初各类学校中的畅销书。

总之,抄印的转化是依自下层到上层、自边缘到中心、自低俗到正统的逆序进行的。与简纸替代一样,文本载体形式转变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进步问题,它往往伴随着社会失序、观念更新诸因素^[39],是社会演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抄印转换实质上是纸抄文本生产体系失效后的产物,既是对原有的书籍生产方式的替代,也是对与这一机制相关的文化观念的更新,初期民间化、无序化的发展,带来出版的自由化,私人性大于官方性,一向不为正统者所重的时文教材、当代诗人小集可被刊行,文人也开始以市场化的传播效应作为创作导向,也加速了抄印转换进程。以贾岛为代表的晚唐诸集是第一批印本化的畅销书,也成为唐末以来几代士人的必读书。故宋初诗人继承晚唐体诗风,不仅仅是一种审美选择,也是抄印转换的一个结果。

三 宋初对唐末五代刊本的接受与晚唐体诗学影响

从阅读史角度看,以上诸论可再得一些印证。宋初文人多将唐人小集奉为经典,如柳开《河东集》卷九记录了他对一家唐诗选本的用心,其云:

《与韩洎秀才书》:因《读孟郊诗》言及足下有卢仝诗数十章。开于十年前在京城书肆中见《唐诸公诗》一策,内有《玉川生诗》约四十余章……

《再与韩洎书》:卢仝诗,非余昔市得之者,今写讫纳上。未得相识,空增永思。^[40]柳开在此所言“唐诸公诗一策”,此策当为“册”,册页的书籍,多为印本;且言书价为“百钱”,非常接近当时印本书价。其中所言卢仝《与马异结交诗》至今仍存于卢集之中,《全唐诗》收卢诗一百多首,此云四十余章,应是选集,但是这部《唐诸公诗》在后世公私目录志中少有记录。又,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十《孟水部诗序》:

余总角之岁就学于乡先生,授经之外,日

讽律诗一章,其中有绝句云:“那堪雨后更闻蝉,曾绝重湖路七千。忆昔故园杨柳岸,全家送上渡头船。”余固未知谁氏之诗矣,及长,闻此句大播人口,询于时辈,则曰“江南孟水部诗”也。^[41]

王氏所引之诗即是孟宾于的一首绝句,这与《京兆府小学规》提及的诗学教材是一致的。宋初文人接触最多的还是贾岛等晚唐诗人小集,这一点由当时诗话中对贾岛等人的诗大量引用,足可见出。《吟窗杂录》所存宋初诗话中,有托名贾岛的《二南密旨》,似为《长江集》导读,如其《论总例物象》曰:岩岭、岗树、巢木、孤峰、高峰、山影、山色、山光、黄云、黄雾、白云、孤云、孤烟、云影、云色、云气、阔云、谷云、烟浪、野烧、重雾、江湖,荆棘,蜂蝶、池井、寺院、宫观、楼台、殿阁、红尘、惊埃、尘世。故乡、故园、家山、乡关、松竹、桧柏、松声、竹韵、松阴、竹阴、岩松、溪竹……^[42]而所列物象词多是来自《长江集》中。其它如李洪宣《缘情手鉴格》、徐衍《风骚要式》、齐己《风骚旨格》、释文或《诗格》、保暹《处囊决》、释虚中《流类手鉴》、王玄《诗中旨格》、王叟《诗格》、徐寅《雅道机要》,以及托名白居易、梅尧臣《金针诗格》《续金针诗格》等,都类似秀句集,收录了大量的贾岛、姚合、郑谷、周朴等晚唐诗人诗句,不难见出这些编者对晚唐诗家小集是很熟悉的。

由本文开头所引欧阳修《六一诗话》所记之事看,晚唐流行的名家诗集到宋初仍在各类乡校中传承,并保持着教材功能。如《梦溪笔谈》卷十四也记一事:“杨大年因奏事论及《比红儿诗》,大年不能对,甚以为恨,遍访《比红儿诗》终不可得……予按《摭言》,《比红儿诗》乃罗虬所为,凡百篇,盖当时但传其诗而不载名氏,大年亦偶忘《摭言》所载。”^[43]如同王建《宫词》等绝句小集一样,罗虬《比红儿诗百篇》兼备俗艳之趣与精巧之句,在一段时间曾作为初学读本而畅销。由沈氏所记看,传至后来,连作者名都已佚没,这是商品化书籍的特色,也表现了印本流传的持续能力。

印本以复制的简捷保证了文本的统一与稳定,也促成了教材的统一化,印本的广泛流行固化了一

个时期的诗学范式，并以入选篇目确定了人们关于唐诗名篇的认同意识。《彦周诗话》所记钱易作《拟唐诗百篇》即反映了这一点：“钱希白作《拟唐诗百篇》，备诸家之体，自序曰：‘今之所拟，不独其词，至于题目，岂欲抛离，本集或有事疏，斯亦见之本传。’故其《拟张籍〈上裴晋公〉诗》曰：‘午桥庄上千竿竹，绿野堂中白日春。富贵极来惟叹老，功名高后转轻身。严更未报皇城晓，胜赏时游洛水滨。昨日庭趋三节度，淮西曾是执戈人。’”^[44]钱易所拟唐诗之底本似为一种“唐诗百首”选本，选家应非钱易本人。张籍集中并无《上裴晋公》一诗，《唐诗纪事》卷五十八中有同题之作，作者是李郢，钱易所和者实为李郢之作。钱易之所以将之误为张籍诗，其因在于所据非张籍原集，而是其时流行的一种中晚唐诗选本《唐诗百篇》，这类民间读物，编撰不尽严谨，传抄多误，如同前文提及的欧阳修少时所读教本把杜荀鹤诗误作周朴诗一样。又，《新唐书·艺文志》录：“郁浑《百篇集》一卷。”注曰：“浑，常应百篇举，寿州刺史李绅命百题试之。”^[45]李绅约大和四年（830）为寿州刺史，这可能就是后世流传的各种“唐诗百篇”的祖本，钱易所和之底本也是由这类选本转化而来。

从唐末到宋初百余年里，刊本化、商品化、教材化的晚唐小集以及各类童蒙读本的流行，固化了几代人关于唐诗名篇的认识，形成一个具有晚唐体风格的唐诗名篇序列，对宋人的唐诗意识产生了初始化的作用。从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到赵蕃、韩澂《唐诗绝句选》，再到周弼《唐三体诗》、赵师秀《众妙集》，其中多有相沿相承的篇目，且多为地位不高，名声不大的晚唐诗人作品，这是由唐末、五代、宋初的“时文”选本中相沿下来的。如，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一《唐诗戏语》言：

士人于棋酒间，好称引戏语，以助谈笑，大抵皆唐人诗，后生多不知所从出，漫识所记忆者于此。“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杜牧《送隐者》诗也；“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李涉诗也；“只恐为僧僧不了，为僧得了尽输僧”，“啼得血流无歇处，不如缄口过残春”，杜荀鹤诗也；“数声风

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郑谷诗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自家飞絮犹无定，争解垂丝绊路人”，“明年更有新条在，挠乱春风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罗隐诗也；高骈在西川，筑城御蛮，朝廷疑之，徙镇荆南，作《风筝》诗以见意，曰：“昨夜筝声响碧空，官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吹将别调中。”今人亦好引此句也。^[46]

其所引诗多见于各类诗话笔记以及《唐诗绝句》《唐绝句选》《唐三体诗》等选本中，除杜甫、郑谷、罗隐等人外，其他五六位作者，多数无单独诗集传世，能成为宋人熟知名作，当缘于这些诗较早就被一绝句体童蒙教材收录了。从唐末到宋初，这类童蒙类读物大多印本化了，传布量甚大，宋人自幼即知晓这些诗，印本固化了唐末以来形成的关于唐诗名篇的认知体系。

欧阳修言他最初接触的唐诗就是郑谷、杜荀鹤等人的作品，早期的教育对他们诗学理念具有初始化的作用，构成了几代人的诗学范式，《六一诗话》中记梅尧臣与欧阳修一段著名对话：

圣俞尝谓予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贾岛云：‘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姚合云：‘马随山鹿放，鸡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萧条，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为工也。”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47]

其中所引最多的仍是贾岛、姚合之作，这些都是晚唐体省净精巧风格最典型的体现，梅尧臣比欧阳修年长五岁。少年时接触到的晚唐体诗集更多，记忆更强烈。梅尧臣由这些诗总结出一个著名的诗学理论：“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48]也就是王安石所说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49]这些都是在浸染了晚唐小集之后形成的诗学理念。《六一诗话》中记载的关于“白战体”的故事^[50]也体现了这一点，这一轶事所禁字辞都是

晚唐体诗中常见词,由上引贾岛《二南密旨·论总例物象》看,这些是几代诗人都熟知的基本语汇,各类教材化的选本与小集早就将这些语料植入到他们的诗学思维中,一当禁用,他们自然“失语”了。

综上所述,在科举文化作用下,唐人以科场名家之作为应试范本,中晚唐后,此风更盛。到唐末五代,社会失序,正统的文本复制机制难以维系,低成本的雕版印刷文本,由民间俗物上升为通行书籍,应试化的选本教材成为一时畅销读物。它们的制作不以上献朝廷为目的,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多是一种自由化的商业行为。至宋初,公私学校已通用印本化的诗学教材,它们或是《名贤绝句》类的选本,或是如《云台集》《玄英集》《唐风集》之类的个人诗集。由于考古实物与相关文献有限,现在尚难知晓五代宋初唐诗小集印本化详情,然仅由方干集、徐夤集、陈咏集的被印就不难推断此事在当时的规模。印本教材固化了应试化的诗学知识,也把晚唐以来流行的名篇序列与追求传播效应的诗学观念普及化了,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唐诗认知系统,晚唐体在宋初的流行与此大有关系。这些印本化的畅销书已成为几代士人的必读书,初始化了他们的诗学理念。直到杨士弘《唐音》、高棅《唐诗正声》、李攀龙《唐诗选》流行,这种晚唐化的唐诗意识才有所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宋初晚唐体风潮是宋初人在印本这一新媒体作用下对唐诗传统的新塑。文学传媒的进步,本身就不是孤立的技术问题,而是社会进化的一个体现,印本地位的上升是社会文化阶层扩容的结果。晚唐体的流行以及以晚唐体为中心的唐诗观的流行,既是中下层士人文化地位上升的表现,也是文学文本印抄转化的一个结果。从这个意义上看,唐末五代小集教材的印本化可从阅读史层面,为宋初晚唐体流行之因提供一种解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韩藏唐诗选本研究”(项目编号18ZDA2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方回:《桐江续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2册,第66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 《瀛奎律髓汇评》,方回选评,李庆甲汇评校点,第9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47][50]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1951—1952页,第1952—1953页,第1951—1952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

[4] 王昶:《金石萃编》,《历代碑志丛书》第七册,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编,第158—15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5] 刘煦等:《旧唐书》,第3430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6][17][38]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丁如明、李宗为等校点,第1860页,第1313页,第18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7] 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注》,朱金城笺校,第27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8][32] 元稹:《元稹集》,冀勤点校,第554页,第555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9] 《松陵集》,陆龟蒙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271册,第24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0] 《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第56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1] 《鼎国诗》已佚,韩藏新罗唐诗选本《十抄诗》中录有10首,见《夹注名贤十抄诗》,释子山夹注,查屏球整理,第138—1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2] 《全敦煌诗》,张锡厚主编,第2745页,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13] 又,《唐宋类诗》二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皇朝僧仁赞序,称罗、唐两士所编,而不载其名,分类编次唐及本朝祥符以前名人诗。”见《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1辑)》下,许逸民、常振国编,第1018页,现代出版社1987年版。或存顾陶《唐诗类选》部分内容。

[14] 韩保全:《世界最早的印刷品——西安唐墓出土印本陀罗尼经咒》,《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委员会编,第404页,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

[15][29][31] 《册府元龟》,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第1782页,第1878页,第7018页,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

[16] 王说:《唐语林校证》,周勋初校证,第671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18] 《全唐文新编》第15册,周绍良主编,第9938页,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0 年版。

[19] 叶某:《爱日斋丛抄》,《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 160 册,第 616 页,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20] 参见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第 1 册,贾贵荣辑,第 331—333 页,北京图书馆 2003 年版。

[21] 《分门古今类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 353 册,第 184 页,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22] 王溥:《五代会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 365 册,第 512 页,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23] 汪应辰:《文定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 77 册,第 677 页,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24] 1960 年在浙江丽水县碧湖镇发现吴越时期印经,其《莲宗宝鉴》卷四有题记:“释延寿师(907—975)念世间业系众生,不能解脱,惟念佛可以诱化,乃印弥陀塔十四万本,劝人礼念。”参见金志超《浙江碧湖宋塔出土文物》,《文物》1963 年第 3 期。

[25] 薛居正等:《旧五代史》,第 1041 页,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26][27] 脱脱:《宋史》,第 12793 页,第 12798 页,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28]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第 39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30] 赞宁:《宋高僧传》,范祥雍点校,第 64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

[33] 唐时书价可于以下两则文献见出:《宣和书谱》卷五载:“(唐文宗时)萧拙于为生,彩鸾为以小楷书《唐韵》,一部市五千金,为糊口计。”见叶德辉:《书林清话》,吴国武、桂泉整理,第 279 页,华文出版社 2012 年版。《唐韵》五卷,一卷千金。又,日本圆仁记:开成三年(838)在扬州“买维摩《关中疏》四卷(印),价四百五十文”。每卷约一百多。释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小野胜年校

注,白化文等修订校注,周一良审阅,第 61 页,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34] 方干:《玄英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 23 册,第 84 页,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35] 贯休:《贯休歌诗系年笺注》,胡大浚笺注,第 1296 页,中华书局 2011 年版。

[36] 欧阳修:《新五代史》,徐无党注,第 640 页,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37] 徐夔:《徐公钓矶文集》,第 2—3 页,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

[39] 参见查屏球《简纸替换与魏晋文学新变》,《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5 期。

[40] 柳开:《河东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 24 册,第 307—308 页,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41] 王禹偁:《小畜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 25 册,第 198 页,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42] 参见《吟窗杂录》,陈应行编,王秀梅整理,第 184—192 页,中华书局 1997 年。

[43] 沈括:《梦溪笔谈》,第 126 页,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年版。

[44]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胡仔纂辑,廖德明校点,第 26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

[45]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 1612 页,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46] 《容斋随笔》,洪迈选,孔凡礼点校,第 145—146 页,中华书局 2005 年版。

[48] 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朱东润编年校注,第 84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49]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第 341 页,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马勤勤